

寂寞向晚石墻院

陳獨秀晚景淒涼

● 呂 平 (前法務部部長呂有文之侄孫，「呂有文傳」請參閱本誌四〇六期)

罵蔣被囚獲釋赴渝

一九三二年一月，日本軍閥窺我中原，挑起淞滬戰役，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，全國憤慨激昂，而國府高層為保存實力，爭取抗日準備時間，倡言「不抵抗」，此舉引起全國發難。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北大

陳獨秀晚景淒涼

教授陳獨秀尤其氣憤填膺，撰文譴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「賣國獨裁」，引發不滿，遭到軍警逮捕，關進監牢。直到一九三七年「七七事變」後，全面抗戰展開，國共聯合作戰，陳獨秀始告獲釋，於八月由南京到漢口，後來又轉到重慶。重慶素有火城之稱，入夏天氣燥熱，加之日機轟炸頻繁，日夜不得安寧，陳獨秀素患高血壓，對這種氣候和環境難以適應，當時為避亂由安徽遷至江津地區，改

名國立第九中學的教職員中，有許多陳獨秀的故舊門生，在同鄉兼好友鄧仲純及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宜的勸說下，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乘船由重慶，順長江而下，來到了江津，也是他人生的終站。

應聘理稿移居江津

陳獨秀偕其妻，最初住在重慶城內郭家公館，幾個月後再遷居黃荊街的延年醫院，是個四合院，前面為診所，後面為住房，陳獨秀夫婦和鄧仲純一家同住後院。由於鄧妻看不慣陳獨秀與妻子潘蘭珍老夫少妻的生活型態，兩家關係很不融洽，陳獨秀便由工商界友人鄧燮康協助遷居城外施家大院，這個院子座落在山坳裡，交通閉塞，加之鄧家的孩子吵鬧，他覺得環境嘈雜，很不適宜，恰巧，這時有前清進士

楊魯承之孫楊慶餘想把祖父遺下的手稿整理成集，聞陳獨秀學識淵博，即請人引見拜見陳獨秀，並邀請他到江津城石墻院楊宅居住。在這之前，陳獨秀在江津舊書攤上閱過楊魯承的手稿，對手稿很有興趣，便欣然答應了，於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日，由妻子潘蘭珍扶持住進了石墻院。

這個四合大院距江津城卅餘里，座落在起伏連綿的鶴山坪最高處，面臨浩蕩長江。四週三公尺多高的圍墻，全部用堅硬的條石層層砌成，故名為石墻院。院內，雖然有些破落，但景致優雅；院外，視野開闊，更有翠竹碧樹蔥蔥郁郁，環境越發顯得清幽。

從此，陳獨秀帶著潘蘭珍在這個僻靜的院子裡，默默地度過了恩愛、恬淡而又淒涼和困窘的最後一段時光……

他先是為楊魯承校正和整理遺著。其中，一本叫《楊魯承先生讀〈皇清經典〉手稿》，一本叫《楊魯承先生遺作六種》。在整理楊魯承的遺稿前，陳獨秀原有極大的興趣和熱情。當陳獨秀知道經史大家章太炎來四川時曾對《讀楊魯承〈皇清經典〉》做過「雜亂無章」的批評後，說：「雜亂無章沒關係，只要稍加整理，就會有理有章了。」可在具體整理過程中，陳獨秀卻感到失望。據當時與陳獨秀有交往的人講，他後來對整理楊氏遺著失去興趣。北大學生龔燦濱一九四二年春天因事回到故鄉江津，他專程到石墻院探望日漸消瘦的陳獨秀。談到楊魯承的遺著時，陳獨秀從床榻的小櫃子順便取下兩本對龔燦濱說：「看過吧？這就是楊先生六種遺著的兩種。《群經大義》很多是轉述前人注疏的，創見不及你們四川的廖季平，《楊氏卮林》評價諸子，則遠遜適之先生。但在《小學》方面倒是有點成就的。」

這種失望，使陳獨秀把很多時間和精力，都用於自己的文字與音韻學的研究。早在南京監獄時，陳獨秀就開始寫這方面的稿子。後來，他又陸續寫出並發表了《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》、《廣韻東冬鐘江中之古韻考》、《中國古史表》、《禹治九河考》等文章。到了江津，陳獨秀仍以主要精力寫這方面的文章，並將這些寫就的學術文章加以整理，取名為《小學識字教本》。最有意思的是，陳獨秀臨終前在《小學識字教本》下卷中寫的最後一個竟是「拋」字！寫完了這個字，他再也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對它進行詮釋了。誰也不知道，陳獨秀當時的真實心情和意思是什麼？他把秘密留給了後人。

書法精妙有求必應

在石墻院那盞昏黃的油燈下，陳獨秀還寫出了一些政治性的文章和書信，比如《我的根本意見》、《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》、《再論世界大勢》、《被壓迫民族之前途》、《給兩流的信》、《給連的信》、《給Y的信》、《給S和H的信》等等。寫作之餘，陳獨秀有時候獨自一人在庭院裡轉轉。他一邊散步，一邊思考一些問題。

更多的時候，是在潘蘭珍的伴隨下，到院外走走。大院外邊，有幾棵根鬚盤結、華蔭如蓋、古老蒼勁的黃桷樹。不遠處，還有一個賣雜貨的小店。陳獨秀常常站在那些地方，和周圍的老百姓擺談，談的基本上都是油鹽柴米，天氣冷暖方面的問題。

逢年過節時，鄉鄰常請陳獨秀寫對聯，他總是有求必應。的確，陳獨秀早年就喜歡書法，並功於篆字。陳獨秀的書法功底深厚。他認為「寫字既要有天分；又要下功夫，天分表現在外秀，也要下功夫鍛煉內功。」他的字可以說完全達到了外秀內功的境地。陳獨秀曾給北大學生，後任江津縣縣長羅宗文寫過一張條幅，那是寫在半幅四尺宣紙上的杜工部的詩句：「穿花蝴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輕輕飛。傳說風光共流轉，暫時相賞莫相違。」一九四二年三月下旬，羅宗文調任銅梁縣作縣長，調離之前，羅宗文又送紙去求陳獨秀題寫對聯。陳獨秀寫的是：「還師自西旅，祖道出東門。」並在上邊題道：「宗文先生長斯邑年餘，今調赴銅梁，出紙索書，因集散氏銘以贈，即乞政之。《獨秀》」下面蓋了兩方印章，一是他的名字，一是《仲甫》二字。誰知羅宗文剛到銅梁上任不久，就在報紙上看到陳獨秀逝世的消息。這副對聯，可能就是陳獨秀的絕筆了。

深居簡出遠離政治

陳獨秀在江津期間，社交活動並不多，尤其是搬到石墻院後，更是深居簡出。

但由於他過去在社會上的聲望，當時江津的社會上層人士很尊重他，地方上的一些重要宴會也請他去參加。陳獨秀在宴會上，已不像往昔那樣談笑風生，而正如一些老人回憶的那樣，他總是沉默寡言，難見笑容。

陳獨秀有時帶著潘蘭珍到江津城東公園內的「支那內學院」遊玩。「支那內學院」是抗戰時期由南京遷往江津的一個佛學研究機構。一九一八年，由佛學大師、書法家歐陽竟無等人在南京創設。後遭日本侵略，歐陽竟無逃難入川，「支那內學院」也隨之遷來。這座學院地處長江邊，風景宜人。院內的高語罕、蘇鴻怡和歐陽竟無三人，都是陳獨秀的老朋友。陳獨秀有時與高語罕、歐陽竟無相聚在一起，談文賞藝，切磋書法，談天說地。偶爾，陳獨秀也在這裡與同鄉、七十多歲的前清進士蘇鴻怡等人一起打打牌。在東門公園遊玩散心的時候，陳獨秀也順便到西門外的康莊一帶踏青賞景。這裡曾經是他短暫居

住過的地方。此處，背依青山，面臨碧水，萬樹桃花，遍地橘林，風景幽美。每每到到這個地方，陳獨秀都流連忘返，不忍離去。他借李白的詩句擊節贊嘆：「問我何時栖碧山，笑而不語心自閑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」並對康莊的主人發出肺腑之言：「此地風景甚好，得此佳景，餘生足矣！」沒有想到，後來他果真得到了康莊主人的慷慨相助，了卻了宿願。

陳獨秀在江津來往最密切的是鄧。一是鄧仲純。他是安徽安慶人，早年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。鄧仲純隔三五天要去石墻院會陳獨秀，一方面去給他看看病，一方面陪他聊聊天。二是鄧蟾秋和他的侄兒鄧燮康。鄧家是江津的名門望族，資產甚豐。鄧蟾秋是江津農工銀行的董事。鄧燮康一九二九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，「五四運動」期間深受《新青年》的影響，對陳獨秀十分仰慕，他當時是重慶民生輪船公司的大股東。他們叔侄比較開明，喜歡辦公益事業，先後捐資在重慶創辦了「蟾秋圖書館」，在江津興辦白沙黑石山聚奎中學。陳獨秀又應鄧蟾秋和他的弟弟聚奎中學董事主任鄧縞仙的邀請，

在白沙鄧氏舊居住了兩個多月。

當然，也有一些要人曾去拜訪過陳獨秀。還在早些時候，張國燾就去找過陳獨秀，他想借陳獨秀這塊招牌再組織一個共產黨，陳獨秀斷然拒絕；胡適想請陳獨秀到美國去寫自傳，陳獨秀沒有答應；周佛海、張伯苓等人想拉陳獨秀進國防參議會當議員，也遭他拒絕。國民黨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和戴笠經蔣介石允許後，兩人曾提著水果、茅台等禮品微服拜訪陳獨秀。開始陳獨秀拒不接見。後來，兩人找到陳獨秀的朋友，也是黃埔軍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語罕通融，才得以見面。陳獨秀表示，自己逃難入川，雖國事縈懷，但不問政治，也不曾有何政治活動，但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陳獨秀請胡宗南和戴笠轉告蔣介石，要好自為之。

生活清貧困頓以終

陳獨秀在石墻院的生活十分清苦。

他住的是兩間廂房，一為臥室，一為書房，二房上無天花板，下是潮濕的泥地，若遇雨天，滿屋漏水。幾塊石頭併為一個泥土灶，在房東廚房靠門的一隅，煮一日清淡的三餐。室內的家具也十分簡陋，

中僅有兩架木床，一張書桌，幾條凳子和幾個裝滿書籍的箱子而已。

陳獨秀的經濟來源，除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費外，主要靠親友的接濟。一是通過原「無產者社」成員薛農山的關係，任《時事新報》名譽主筆，每月只領一點少得可憐的津貼；二是偶爾為《東方雜誌》和國民黨教育部所屬中央編譯館寫稿領一點稿費；三是「北大同學會」捐贈給他一些生活費；四是陳獨秀大姐一家在其困難時，也曾給予他一定的幫助；五是好友蔡元培、鄧蟾秋叔侄、楊鵬升等人的慷慨資助，連印有「獨秀用箋」和「仲甫手緘」的信紙信封，也全由朋友包贈。但是，陳獨秀對贈款並非所有都接受：首先，素無知交者，不願無緣賜。其次，無功不受祿。

陳獨秀因此贏得人們的普遍崇敬，各自都來關心幫助他，其中最突出的是當年北京大學畢業的有關人士組成的聯誼會組織「北大同學會」。該會不僅定期資助陳獨秀生活費，還具體委托北大學生羅漢照顧陳獨秀入川後的生活。一九三九年五月重慶大轟炸，羅漢遇難，又繼續委托北大學生何之瑜來江津照顧陳獨秀。「北大同

學會」及羅漢、何之瑜的照顧和幫助，是陳獨秀晚年生活安定度過的重要保證。為此，陳獨秀十分感激。他後來把書稿《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》和《連語類編》贈給北大，以資報答。對其他親友的資助，他也以字條、字聯、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贈，儘管這種報答是象徵性的。而資助陳獨秀的親友都知道他「無功不受祿」的脾氣，在接濟時，故意請他寫字破石。但是，即使這樣，由於物價猛漲，陳獨秀的生活還是十分窘迫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二日，陳獨秀在致好友的信中說道，他家每月生活費達六百元，比上半年加一倍。因此，有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。辛亥時期的老朋友柏文蔚將軍自湖南永綏到重慶開會時，專程到江津看望陳獨秀。他見陳獨秀穿著十分單薄，當場脫下灰鼠皮袍贈給陳獨秀禦寒。陳獨秀後來也不得不將此灰鼠皮袍拿到了典當舖。一九四一年冬天，他在向歐陽竟無借《武榮碑》字貼時寫了一首詩，無意中透露了自己十分清苦的生活：「貫休入蜀唯瓶鉢，久病山居生事微，歲暮家家足豚鴨，老饒獨羨武榮碑。」一九四二年一月，陳獨秀寫信告訴楊鵬升，打算遷居貴陽：「川中生活，日益不支，弟病

雖未全好，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，以彼處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。」但後來他取消輾轉南方的打算：「貴陽之行已決計作罷，終以病體不勝此跋涉也。」足見其生活之困窘。雖然陳獨秀取消了南行的計劃，但他的信卻引起了楊鵬升的深深不安，他給陳獨秀去了一封信，同時以索寫大字對聯為名，匯去現金一千元作為對書聯的報酬。誰知，這又引起了陳獨秀的深深愧疚，他在四月五日的回信中寫道：「前兩次厚賜，於心已感不安，今又寄千元，見出於吾兄之請求，更覺慚愧無狀，以後務乞勿再如此也。前敬題大聯，恐未曾寄到，來函云收到者，殆偽造此言以慰我耳。」好朋友用心良苦的美麗謊言，既讓陳獨秀感到溫暖與感激，更使陳獨秀覺得尷尬與無奈。字裡行間，包含著多少難以言語的艱辛。為了節約開支，潘蘭珍在石墻院的空地上開闢了一小塊地，種上菠菜、蒜苗、洋芋等陳獨秀平時最愛吃的蔬菜。空閒時，陳獨秀也常常給菜地澆澆水，施施肥，捉捉蟲，借以排遣心中的鬱悶與孤獨。

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七日夜，陳獨秀在石墻院溘逝。遺體葬於江津城西門外的康莊。

附錄：陳獨秀小傳

前清秀才富新思想

陳獨秀原名陳乾生，字仲甫，別署實庵、仲（子）由己，一八七九年十月十八日（清光緒五年農曆八月二十三日）生於安徽省懷寧縣的一個小戶人家，父親是位秀才。陳獨秀出生才數月，父親見背，幸其母頗有才幹，辛苦持家。他的祖父有美蓉癖，但獨愛陳獨秀，於其六歲時，親為其啟蒙，授予四書五經，繼續左傳，祖父督課甚嚴，動輒夏楚。母以淚眼慰勉，使陳獨秀很感動，故而後來的自傳有「母親的眼淚，比祖父的板子，著實有威權，是叫我用功讀書強有力的命令」的語句。

陳獨秀晚景淒涼

陳獨秀九歲時，祖父病故，乃隨塾師讀書，但不喜習八股文，十二歲時由其長兄陳孟其教讀「昭明文選」，並重溫經書，研讀袁枚諸人制藝。一八九六年，勉強出而應考，竟得中第一名秀才。一八九七年啣母命入貢院應試，蹙居號舍九天，目睹考場怪狀，感慨萬端，而有心革除國家積弊，乃決定新動向，因讀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的文章，大受影響，不願鄉試結果，

轉往杭州，入求是書院讀書，主修英、法文和海軍建築學。

一八九九年，回安慶，創辦「安徽白話報」，宣揚新思潮。一九〇〇年，東渡日本留學，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讀書，一九〇二年冬，和留日學生馮自由、程家樞、蔣方震等組織「青年會」，明白揭示以民族主義為宗旨，破壞主義為目的，陳獨秀、蘇曼殊等均參加。當時留學生監督姚昱常無端干涉學生。學生決予報復，乃由張繼抱姚昱之腰、鄒容捧姚頭，陳獨秀揮剪，稍稍發抒割髮代首之恨。遂致釀成交涉大故，陳與張、鄒均被遣送回國。

陳獨秀回國後回安徽，一九〇三年五月廿一日約集皖省志士開演說會。他演說指陳：「當今非提倡軍人精神，斷不足以立國，外患日亟，瓜分立至，吾輩恐有不足為牛馬奴隸之一日。」會後組成「愛國會」——內分「演說」「體操」各會，並附設「愛國新報」。陳當又宣示：「如辦有基礎，擬與上海愛國學社通成一氣，並連絡東南各省志士，創一國民同盟會，東南方可望獨立，不受異族之侵凌。」顯示陳獨秀對鄒容、吳敬恒、蔡元培、章炳麟、章士釗等在上海活動很注意，且有相

互聯繫呼應計劃。

是年七月七日，上海「蘇報」被查封，鄒容、章炳麟等入獄。陳獨秀與章士釗、張繼、連橫（雅堂，筆名慕秦）等再接再厲，於八月七日創刊「國民日日報」。其中「文苑」欄有陳獨秀署名「由己」的舊體詩——哭汪希顏：「歷史三千年黑暗，同胞四百兆顛連。而今世界須男子，又殺支那二少年。」「壽春倡義聞天下，今日淮南應有人。說起聯邦新制度，又將遣恨到君身。」詩句。由於該報言論激烈，發行未三月即被禁。

一九〇四年春，蔡元培等在上海創「警鐘日報」。陳獨秀卻臥病家鄉，但時有舊體詩刊載於此報端。是年秋，陳在蕪湖創「安徽俗話報」，開始用白話撰述。

一九〇七年，陳獨秀在浙江陸軍小學任國文教習，作革命檄文多篇，隊官周亞衛等為之分貼衙署，省垣官吏閱之悚然，陳獨秀被迫離開杭州。一九一一年，辛亥革命發生，翌年五月三日，柏文蔚任安徽都督，陳獨秀被委為秘書長，七月，調任教育司司長，一九一三年八月，二次革命失敗，陳獨秀避難蕪湖，被駐軍逮捕，由劉叔雅、范鴻儒保釋，乃再赴日本。

刊行雜誌言論激越

一九一四年六月，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。陳獨秀接近黃興主張，旋參加「歐事研究會」，並協助章士釗創刊「甲寅雜誌」。一九一五年夏，自日本返國。九月十五日，發刊「青年雜誌」。號召青年自覺。

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，「青年」雜誌改名「新青年」，十月一日第二卷第二期刊有陳獨秀所撰「我之愛國主義」一文，提出「為國捐軀之烈士，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，會當其時，願諸君決然為之，無所審顧。然此種愛國行為，乃一時的而非持續的，乃治標的而非治本的」。「吾之所謂持續的治本的愛國主義者：曰勤、曰儉、曰廉、曰潔、曰誠、曰信」。他以為「之數德者，固老生之常談，實救國之要道」。

在「青年」月刊刊行期間，陳獨秀的言論尚稱平實，但自「新青年」第二卷第二期刊出陳之「憲法與孔教」，情勢開始轉變。同卷第五期刊載胡適自美國寄來之「文學改良芻議」，陳即於第六期（一九一七年二月）中撰刊「文學革命論」：

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，高張『文學革命軍』大旗，以為吾友之聲援。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：曰推倒雕琢的、阿諛的貴族文學；建設平易的、抒情的國民文學。曰推倒陳腐的、鋪張的古典文學；建設新鮮的，立誠的寫實文學。曰推倒迂晦的、艱澀的山林文學；建設明瞭的、通俗的社會文學。」

胡適的「文學改良芻議」，原為和平討論文字，陳獨秀的文章幾乎已主張「革命」。當時歐戰方酣，國內則帝制傾覆，皖系軍閥執政，措置失當，民不聊生，「新青年」第三卷刊有陳獨秀討論政治的文字，已顯示他將有新動向。

陳獨秀主編「新青年」之餘，兼主「中華新報」筆政，經常撰文陳述對國事的意見，筆鋒激越。

任教北大反對舊學

陳獨秀輪流主編。一九一八年一月發行之第四卷開始刊載白話文稿，並有政治評論，宣揚擁護德先生（Democracy）、賽先生（Science）。極力反對孔教及國粹與舊文學，甚至主張廢除漢文。對國內各都市學校青年發生甚大影響力。

由於胡適等主張「新青年」不宜討論實際政治，而陳獨秀與李大釗則認為談論政治的條件已經成熟，陳、李乃另創一「每周評論」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行。陳撰「發刊詞」指陳創刊宗旨在「主張公理反對強權」。對於第一次大戰中，英、法、俄等協約國戰勝，認為是「公理戰勝強權」的明證。對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言的平等與自由極端讚揚。然而不到兩個月，「巴黎和會」對我山東問題的決議，使北大學生及民間極為憤慨，「每周評論」刊載陳獨秀撰「公理何在？」一文，表達了知識分子的心理轉變。巴黎和會不利我國的消息紛傳，知識分子紛紛以輿論支持我國外交鬥士，「每周評論」及各報對時局詳細報導，北京晨報「山東亡矣」等短評，「新青年」「馬克斯主義研究專號」。均有鼓盪作用。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及「六三」學生運動即在這一背景襯托中發生

。旋且擴及國內各地。北京政府以鼓動暴亂為由，於六月十一日逮捕陳獨秀。李大釗亦遠走故鄉。「每周評論」改由胡適主編，至八月三十一日即永遠停刊。「新青年」亦停刊半年。

陳獨秀被監禁三月獲釋，旋辭去北大教職，南下上海，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「新青年」在上海復刊，十二月一日發行的第七卷第一期上，陳獨秀撰發「本誌宣言」，其中「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和社會改造，和過去及現在的各黨派斷絕關係。」顯示他的政治動向已有新方向。同期「新青年」刊載他所撰的時論，顯示他對布爾什維克（蘇俄共黨）歷史認知有誤。

連任中共黨總書記

一九一九年七月，蘇俄宣布廢除帝俄時代對華一切不平等條約，引起國人對俄好感，第三國際且命遠東局書記處派遭維辛斯基（Grigori Neumovich Voitinsky）以「吳廷康」化名與楊明齋來北京與李大釗晤談，經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晤陳獨秀。

陳獨秀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在上海船務機房工界聯合會演說「勞動者的覺悟」，申言勞動者的最後目的是爭取「管理

政治軍事產業，居於治人的地位」。這是「無產階級專政」口號出現中國的第一次。

陳獨秀與吳廷康及若干有共同興趣友人多次會談後，工作更趨積極；創立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、發行白話報、舉辦演講會、設立平民學校以教育工人。八月十五日，出版「勞動界」周刊。旋成立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」。十月十二日，成立「上海機器工會」、「外國語學社」，劉少奇、任弼時即加入此學社其後並被派往莫斯科學習。十一月七日創刊「共產黨月刊」。毛澤東即由此稍稍了解馬克斯主義及布爾什維克面目。

此時，英國學者羅素應梁啟超之邀來華講學，在羅素抵華前後，「新青年」已翻譯連載羅素的論文，如遊俄感想「布爾什維克主義理論與實際」等，羅素認為中國政治改革，應採用俄國方法，不宜用西方平民政治。基於此，陳獨秀於「新青年」撰隨感錄，一再引述羅素的談話，認為是中國政黨改造的一大暗示。

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離上海赴粵，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。在陳炯明支助下發行「群報」，進行共產宣傳與組織工作。陳獨秀

原曾與若干無政府黨人組成「社會主義者同盟」。開始在理論上發生衝突，此一「同盟」組織旋告解體。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作公開的理論鬥爭。陳獨秀在一篇論文中強調中國需要「早日造成一個名稱其實的『開明專制』之局面，好將普通資格之水平線以下的人救到水平線以上」。這顯示陳獨秀已公開放棄在「新青年」所倡導之「德先生」（民主政治）。

一九二一年七月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秘密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。陳獨秀因廣州工作忙碌沒有參加，但提出有關組織及政綱意見。陳獨秀旋經此一十二人會議推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長（總書記）。陳獨秀在廣州完成共黨支部組織工作後，於是年秋赴上海，與自粵北上之第三國際代表馬林（Maring）會談，同意遵隨第三國際政策並接受其財政支助以便活動。

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第二次大會，陳獨秀被選連任總書記。八月，中共中央委員會在馬林指示之下，決定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。陳獨秀認為此舉有其必要性。在此前後，共黨在國內各地成立甚多支部，工人運動發展亦速。發行「嚮導周報」，陳主筆政。

一九二五年，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陳獨秀仍連任總書記，「五卅」慘案及香港學生大罷工發生，使中共勢力在農學生中益形擴張。中共煽動學生參加各地農運動，並參與該校校務會議，干涉學校行政，對教育風氣產生了不良的影響。

一九二六年七月，國民政府誓師北伐。陳獨秀在「嚮導周報」上表示非議。當北伐軍順利進展，陳獨秀又命令各地支部積極發展群眾組織。一九二七年三月「寧漢分裂」以及上海三次暴動，都有共黨幕後運作，四月五日，陳獨秀與甫自法經莫斯科回國之汪兆銘聯名發表宣言。兩人旋即西上武漢。鮑羅廷製造的赤色政權出現，與蔣中正正在上海南京清除共黨行動，涇渭分明。

被指托派免總書記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中共第五次全國大會在武昌舉行。發生彭述之與瞿秋白的鬥爭。陳獨秀調和其間，未能彌補裂痕。陳仍當選為中央總書記。大會通過新政綱，提出「土地革命」及「由地方群眾的民權獨裁，至建立中央的民權獨裁」口號。

五月下旬，湖南駐軍展開激烈的除共

行動，第三國際聞訊，號令中共採取嚴厲對抗行動，汪兆銘為之震怒。七月十三日，中共宣布退出國民政府及國民黨，陳獨秀乃堅持國共合作到底的口號。八月一日，中共在南昌暴動，七日，中共在武昌舉行緊急會議（俗稱八七會議），改組中央委員會，推瞿秋白為總書記，推倒陳獨秀在黨的領導地位，陳獨秀被指為中國共產黨的托派。

一九二八年秋，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，通過譴責陳獨秀領導錯誤的文件。一九二九年八月，我政府收回中東鐵路路權，蘇俄大軍侵我東北，中共高呼「擁護蘇聯」的口號，陳獨秀三度寄信中共中央力表反對，中共除公開答覆外，並以黨的命令派陳獨秀赴莫斯科，遭陳獨秀拒絕，十一月十五日，中共中央決議開除陳獨秀、彭述之、劉仁靜、高語罕及李季等人黨籍。被開除黨籍後，陳獨秀等人自稱為「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」，中共幹部則指他們是「托陳取消派」。

一九三一年淞滬戰役後，陳獨秀、彭述之等被捕，次年四月十五日，江蘇高等法院審訊陳獨秀、彭述之。章士釗曾自任陳的辯護律師。是月二十六日宣判：陳、

彭共同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，各處有期徒刑十三年、褫奪公權十五年。陳獨秀在獄中以研究我國古代語文以自遣，曾撰有短篇論文送刊「東方雜誌」發表，直到一九三七年，全國團結抗日，陳獨秀獲釋，轉赴四川江津定居，而於一九四二年病逝。去世前，他的思想已有很大的轉變，認為「為了無產階級的民主，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年」。

一九三八年底，陳獨秀擁護國共合作由國民黨領導抗日，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及抗日游擊隊，試圖組織「不擁護（國民黨）、不阿共（中共）的第三勢力」，被王明、康生等人誣陷為日本間諜，使他徹底與中共決裂，直到辭世。身後的主要著作有「陳獨秀文存」及「陳獨秀文章選編」等。

陳獨秀有二子，長子陳延年（一九〇〇—一九二七），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儉學，旋即成為中共要角，一九二二年赴莫斯科，入東方勞動大學，一九二五年回國，領導廣州暴動，一九二七年夏任中共長江局書記，旋被捕遭處決。次子，陳喬年，亦為留法勤工儉學生，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第二期，回國後，在上海發展工人組織，一九二八年一月被捕身死。